

《東華漢學》第7期；67-128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8年6月

宋人詩集之刊行與詩分唐宋 ——兼論印刷傳媒對宋詩體派之推助

張高評*

【摘要】

雕版印刷崛起繁榮於宋代，與寫本藏本爭輝爭勝，蔚為宋代博觀厚積、注重讀書之文風，助長宋詩特色之形成，提供唐宋變革之觸媒，「詩分唐宋」自當以印刷傳媒作為催化劑。本文論述宋詩別集在宋代之雕版印行，發現騷人墨客之審美品味，攸關圖書市場之好惡取捨，而圖書版刻質量之優劣多寡，大抵與詩集選集傳播接受之寬廣度有關，更與宋詩之發展嬗變埒鼓相應。宋詩名家大家，如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為宋詩特色之先導；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為宋詩宋調之建構；陳師道、陳與義、范成大、楊萬里、陸游，見江西詩風之嬗變；邵雍、朱熹詩歌，得理障理趣之消長；劉克莊、戴復古二家，知宋詩宋調之變奏；凡曾影響當代，流傳後世者，其圖書傳播除寫本、鈔本外，又皆有頗多

*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之雕版印本作為圖書傳媒。宋人選刊宋代詩文總集，從審美品味與商品經濟，亦可考察宋詩體派之流行，如《西崑酬唱集》之於西崑體，《三蘇先生文粹》、《坡門酬唱集》之於東坡體，《江西宗派詩集》之於江西詩派，《四靈詩選》之於四靈詩派，《江湖集》前、後、續集，《兩宋名賢小集》、《詩家鼎鑪》之於江湖詩派，《瀛奎律髓》之於一祖三宗。雕版刊行，因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優長，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利多，相較於寫本鈔本，印刷傳媒遂快速成為知識傳播之利器。

關鍵詞：印刷傳媒、宋詩體派、宋刊宋人詩集、詩分唐宋、圖書傳播

自東漢蔡倫發明紙張，相較縑帛竹簡之貴重，更便利於書寫，於是天下風行，「莫不從用」。¹至東晉，紙卷始普遍應用，始完全替代竹木簡牘，知識傳播進入「寫本」時代。²西晉傅咸曾撰寫〈紙賦〉，對於知識傳播之媒介，由竹簡轉換為紙張，形成諸多優越與效能，尤其影響文學創作，多所強調，其文曰：

……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群索居，麟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于萬里，精思于一隅。（傅咸〈紙賦〉，《藝文類聚》卷五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六，文字各有詳略，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8月，頁1053）

紙張取代竹簡，使寫作思維更加流暢，使文本傳播更加便利而行遠，所謂「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寫情于萬里，精思于一隅」，同時也促成文學觀念之轉變，與文體論之發達。³由此可見，知識載體之改變，必然影響寫作之思維方式，左右文學之審美價值，決定知識傳播之質量和範圍。寫卷相較於竹簡，有諸多便利。唐詩之傳播與當代接受，除唐人選唐詩外，傳世之敦煌寫本卷子，可作代

¹ 范曄：《後漢書》卷一百八，列傳六十八〈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迺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引自〔清〕王先謙《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長沙王氏校刊本，1958年），頁897。參考楊巨中：《中國古代造紙史淵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三章〈東漢蔡侯紙〉，頁107-158。

² 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四章（一）〈書籍用紙〉，頁82-83。

³ 查屏球：〈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朱東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頁405-416。

表。⁴無論官府私家藏書，或士人抄錄傳寫，撰稿作文，皆是寫本。寫本雖較帛書竹簡便利，然作為圖書傳播，仍存在「難成、易毀、價昂」，及體積龐大、攜帶不變諸缺失。白居易生前手編詩文集，抄錄五部，三本分置廬山、蘇州、東都寺廟，一本付姪兒，一本付外孫，唯恐散佚，⁵可謂思周慮密矣。然經五代喪亂，至北宋，白氏手訂寫本，已亡佚不傳。⁶其他前代別集論著之稿本寫本，或只一、二本，散佚不可再得者，豈在少數？降低圖書之散佚率，增加圖書之流通量，實有待雕版印刷之複製圖書。

一、寫本印本之爭輝與宋朝之圖書傳播

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探討中國歷史分期，提出「唐宋變革」說，「宋代近世」說；其弟子宮崎市定（1901-1995）證成其理論，發揚光大，形成京都學派。⁷其說影響陳寅恪（1890-1969）推崇宋代，以

⁴ 參考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台北：洪範書店，1987年5月）；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

⁵ 六十卷本《白氏文集》，奉納廬山東林寺經藏院；六十五卷本《白氏文集》，奉納洛陽聖善寺；六十七卷本奉納蘇州南禪院；七十卷本送廬山東林寺。說見《白氏文集》卷六一，〈東林寺白氏文集序〉、〈聖善寺白氏文集記〉、〈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卷六九〈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臯上人〉。卷七一〈白氏集後記〉稱《白氏文集》有五本，除廬山、蘇州、東都各一本外，又「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于後。」參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上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頁7-11。

⁶ 萬曼：《唐集敘錄》，《白氏文集》敘錄，（台北：明文書局，1982年2月），頁239-248。

⁷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第四章〈宋代近世說〉，頁96-122；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

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⁸其後，傅樂成強調「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⁹繆鉞區分唐詩與宋詩風格之異同，錢鍾書綜論歷代古典詩，標榜「詩分唐宋」，¹⁰皆受內藤學說啟示而有所發揮。筆者以為，研討上述課題，多可以印本崛起，甚至替代寫本作為關鍵切入口。

唯京都學派及其後學，包含近現代研究中國歷史分期者，發微闡幽內藤學說者眾，考察唐宋所以異同，宋代所以變成近代之開端，除論述政治、科舉、任官、黨爭、經濟、學術、藝文、兵制、法律諸文化史因素外，¹¹對於雕版印刷在宋代之繁榮普及，影響知識傳播，促成文明昌盛，激盪政治、經濟、科舉、學風，要皆闕略而少論。筆者最近搜集印刷史料，參考版本學、目錄學、論文集資料，撰成《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一書，企圖以印刷傳媒為核心，加上寫本、藏本之流通傳播，以之詮釋唐宋詩之異同，平議唐宋詩之紛爭，解讀唐宋詩之特色，進而論證錢鍾書所倡「詩分唐宋」之說，或可提供內藤湖南所謂「唐宋變革」之補充論證。印刷傳媒發揮之效用，究竟造成哪些影響？促成何種變革？生發何種轉變？多值得探索。

（一）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圖書傳播

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5-56。

⁸ 參考王水照：〈陳寅恪先生的宋代觀〉，《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8年12月），頁1-16。

⁹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原載《國立編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後輯入氏著《漢唐史論集》中，（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77年9月），頁339-382。

¹⁰ 繆鉞：《詩詞散論·論宋詩》（台北：開明書店，1977）；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一、〈詩分唐宋〉，頁1-5。

¹¹ 參考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頁125-171。

雕版印書，大抵起於隋唐之際印刷佛像佛經。至五代馮道以之雕印經籍，「隨帙刻印，廣布天下」；北宋國子監始設書庫監官，雕印經史群書，「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此種「敦本抑末，務廣其傳」之政策，被視為「聖教之一助」。北宋監本印刷圖書更有平準書價之功能，遂影響各路州縣官府、書院、寺觀，熱絡雕印圖書。太宗、真宗朝訪求遺佚，悉令刊刻：於是公私版本流播海內，促成宋代印刷圖書之勃興：

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五代會要》卷八，〈經籍〉，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4月，頁96）

淳化五年……（國子監）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宋史》卷一六五，〈職官五〉，北京：中華書局，1990，二刷，頁3916）

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書悉歸藏室。太宗、真宗訪求遺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又經書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備，起秘閣貯之禁中。（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慶曆崇文總目〉，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頁1043）

宋代之監本書價，基本與工本費（成本）相當；監本以外之其他圖書價格，也依隨監本書價起伏。加以朝廷優禮文官，俸祿優厚，故士大夫、地方官員，普遍經濟寬裕，消費能力強，足以刺激圖書買氣。¹²再者，雕版印刷之圖書，利潤可觀，於是各地「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謀

¹²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論宋制錄之厚〉，杜維運考證，（台北：樂天出版社，1971年9月），頁330-331。

衣食」；官員或亦甘冒觸法，走險牟利，¹³因時乘勢，遂蔚為「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之盛況。其中，朝廷文化政策之指向，更是一大指標，如：

曩以群書，鏤于方版，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將使庠序之下，日集于青襟；區域之中，咸勤于素業。敦本抑末，不其盛歟！其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宋大詔令集》卷一五〇，天禧元年九月癸亥；《全宋文》第六冊，卷二五五，宋真宗四四，〈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詔〉，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11月，頁714）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小。今用襄紙而價高。紙既不迨，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求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敕旨。（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一，〈論國子賣書狀〉）¹⁴ 唐以前藏書，皆出鈔寫。五代始有印板。至宋而公私板本流布海內。自國子監秘閣刊校外，則有浙本、蜀本、閩本、江西本，或學官詳校，或書坊私刊。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誇。（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卷一《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

宋真宗詔示：國子監所雕版之經書，「更不增價」，強調知識傳播之意義。其後，監本因用紙不同而醞釀調價，於是陳師道上書議論。陳

¹³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兼論印本圖書對學風文教之影響〉（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二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6年6月），3、〈運用公帑，刊書營利〉，頁23-25。

¹⁴ 陳師道：〈論國子賣書狀〉貼黃云：「臣惟諸州學所買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引自《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卷十一，頁10。

師道高揭「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大纛，請求監本書籍「止計工紙」，目的有兩個：其一，「冀學者益廣見聞」，其二，「稱朝廷教養之意」。於是哲宗接納建議，監本書恢復原價。影響所及，公私板本流布海內，「士大夫往往以插架相誇」，盛況之空前，論者以「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形容之，於是宋代蔚然成為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¹⁵

印本之所以繁榮，關鍵在印刷術對於書籍之複製，有五大優勢：其一，產量增加；其二，成本降低；其三，形式統一；其四，流傳廣遠；其五，留傳後世。¹⁶版印圖書能化身千萬，打破時空，無遠弗屆，流傳後世，對士人尤有「愛日省力」、博極群書的效應，因此，持續興盛不衰。加上印刷圖書，利潤豐厚，更引發書坊刻書之熱潮。¹⁷於是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開封、蘇州、杭州、建陽、成都、南昌先後紛紛形成刻書中心，致有官刻本、坊刻本、家刻本、書院刻本之目。學者強調：宋代為雕版印刷技術發展之黃金時代，南北宋三百餘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廣，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¹⁸印刷圖書作為傳媒，其影響士林、文苑、詩壇、學界，可以想見；而士林學界之反饋於印刷傳媒，助長其興盛繁榮，亦轉相挹注，形成反應回路。¹⁹朱熹於南宋，既檢舉唐仲友假公濟私，刻書牟利；抨

¹⁵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插圖珍藏增訂本，2006年10月），第一章，〈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頁40-161。

¹⁶ 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2月），〈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一）印刷術對書籍製作的影響，頁263-266。

¹⁷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印本之普及與朝廷之監控〉，《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5年12月），頁10-14。

¹⁸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第四章第一節，頁50；參考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五章〈宋代的版印概況〉，頁87-128。

¹⁹ 余秋雨：《觀眾心理學》（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6年1月），第三

擊書肆拼湊諸稿，「不告而刊」；然又籌劃出資刻書，致力書籍印賣，對建陽刻書業之繁榮，有促進貢獻。《朱子語類》卷十〈讀書法〉，稱：朱子十分憂心「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對於雕版印刷作為傳媒，堪稱沛然莫之能禦的時代文風趨勢，迎拒得失之際，朱子之舉動與論述可作代表。²⁰由此觀之，閱讀心態、思維定勢、創作策略、發表方法，因知識傳媒由寫本轉為印本，而生發不同之效應；亦因上述效應之轉變，回過來指引和調整圖書傳媒，形成寫本和印本之此消彼長、勢均力敵，甚至印本取代寫本。

試考察《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宋人筆記、《宋史》諸文獻之印刷史料：宋太宗倡導雕版印刷，至真宗朝而「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靖康之難，典籍散佚，高宗朝定賞求書，至孝宗淳熙間，「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往往鋟板以為官書」（《宋會要輯稿》〈崇學四〉），於是印本與寫本競妍爭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可以考見。其後印刷傳媒與商品經濟結合，促使南宋刻本書激增，漸漸而刻本數量超越寫本，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書，可見其中消息。咸淳間（1265-1274），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取校23種版本，清一色為印本，無一寫本。從此之後，刻本書籍取代寫本，幾乎壟斷了圖書市場，從新寵躍升為主流。明胡應麟曾云：「凡書市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咸廢不售矣」，印本刻本之價廉物美，成為圖書傳播之寵愛，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印本與寫本圖書之於知識傳播，由相得益彰、相互爭輝，而此消彼長，終而印本勝過寫本，印本圖書於知識傳媒之效能與影響，值得

章〈反饋流程〉，頁66-67。

²⁰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兼論印本圖書對學風文教之影響〉（下），（三）〈印本圖書之繁榮及其連鎖效應〉，頁18-36。

研究和重視。

雕版印刷作為圖書複製技術，繁榮而普遍運用於兩宋，與科舉取士搭配，成為趙宋右文政策之兩大頂門柱。由此觀之，宋代士人之閱讀圖書，除魏晉以來之寫本藏本外，更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印刷圖書，作為知識之傳播媒介。印刷傳媒在宋代之崛起，對於知識之傳播接受，圖書之流通與典藏，閱讀之心態、思維之策略、創作之方法、學術之風尚、論著之形制，勢必多有影響。推而至於科舉考試、書院講學、教育普及、文化轉型，多與印刷傳媒之繁榮發達有關。

依據《宋史藝文志》統計：宋初開國，圖書才萬餘卷；仁宗慶曆十一年（1041）纂修《崇文總目》，已著錄藏書三〇六六九卷；終北宋之世，圖書目錄，凡六七〇五部，七三八七七卷。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編次《中興館閣書目》，著錄藏書四四四八六卷；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編修《中興館閣續書目》，再著錄一四九四三卷。《宋史·藝文志》所著錄四部典籍，共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宋代刻書業興盛，不僅前人著作陸續開雕傳世，以供研讀借鏡；即當代作品亦多印刷成書，因得流傳後世。宋代之版刻，對於書籍之流布，知識之傳播，貢獻極大。王世貞《朝野異聞錄》載：明權相嚴嵩被抄家時，發現家藏宋版書6853部，可見雕版圖書作為知識傳媒，有利於流通與度藏。宋版書存世於今者，日本阿部一郎教授考察，全世界約有2120種，凡3230部以上。由宋代之藏書目錄，明代宋版書之流傳，以及當代海內外宋版書之著錄，可以推想宋代圖書流傳之盛況。²¹

²¹ 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十一章〈宋代的刻書與藏書〉，二、版本的流傳，頁485-487。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宋代版刻述略〉，頁21。

(二) 圖書傳播與印刷傳媒之效應

印刷傳媒之繁榮昌盛，與寫本競妍爭勝，作為知識傳播之媒介，贏得更多之信賴與喜愛。然東晉六朝以來，寫本藏本之流通傳播，仍並存不廢。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麟臺故事》記載：宋代秘閣三館所藏，除印本外，「借本繕寫」之孤本善本尤多；民間藏書家，亦多手自傳鈔校讎，往往有善本完本。要之，北宋之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關鍵在印本之崛起風行，作為知識傳媒，印本與藏本寫本相輔相成，相互爭輝，相得益彰。

由於雕版圖書之崛起與繁榮，配合科舉考試之實施，²²蔚為宋代藏書事業之盛況空前。無論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寺觀藏書，質量均十分可觀。舉凡藏書的品種數量，或藏書之內容、藏書之方式方法、藏書之利用、藏書之思想、理論，宋代皆超越前代。朝廷有三館秘閣，「掌凡邦國經籍圖書」之編纂、典藏、校勘、出版；各路州縣，官府或私人，亦有館藏圖書，可資借閱。宋代私家藏書可考者，約在400名以上；兩宋書院，近400餘所，亦皆有其藏書。佛寺道觀，屢印《藏經》、《道藏》，亦藏書豐富。²³宋代四大藏書系統，蔚為輝煌之藏書文化，對於圖書傳播、閱讀接受、思維創發、論著方式、學風趨向，多有激盪與影響。

印刷傳媒與寫本藏本圖書引發豐富而多元之傳播訊息，將可能促進宋代社會發展之動力，形成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之不同。尤其是雕版印刷「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的傳媒效應，較

²²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宋代科舉用書考論〉，頁261-283。

²³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四章〈宋遼金時期藏書〉，頁134-218。

諸楮墨簡帛，「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明胡應麟早有斷言。²⁴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稱：「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²⁵錢存訓亦斷言：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在中國和西方一樣，「對學術風尚和社會發展，可能都產生一定的作用」；印刷術的普遍運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²⁶日本吉川幸次郎斷定，印刷術在宋代之傳播，促使宋人歷史知識遠較唐人豐富，蔚為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²⁷清水茂教授指出：遠離中央朝廷偏僻之福建，孕育發展出朱熹閩學，實因福建出版業之興盛，造就學者輩出，人才如林。²⁸印證了李約瑟、錢存訓《中國科技史·書與印刷術》之斷言。李弘祺研究宋代教育，亦強調雕版印書之重大影響：「雕版印書對於大規模散播書籍，標誌著中國歷史上重要轉折點的出現」；²⁹雕版印書對唐宋變革具有催化作用，諸家之說已多所提示。

趙宋一朝，既實施右文，於寫本、藏本外，圖書複製之技術、知識傳播之渠道，又增多一雕版印刷之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印本崛起繁榮，與寫本爭輝爭勝，終而取代寫本，成為圖書傳播之主流，對於教育、科舉、學術、藝文、思潮、風尚諸方面之激盪，主體影響如何？個別效應又如何？學界於上述之整合研究，探論不多，成果十分有限。筆者嘗試

²⁴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8月），卷四，〈經籍會通四〉，頁45。

²⁵ 《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孔凡禮點校本，1986年3月），卷十一，〈李氏山房藏書記〉，頁359。

²⁶ 錢存訓、鄭如斯編訂：《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頁356。

²⁷ 吉川幸次郎：〈宋人の歴史意識——資治通鑑的意義〉，《東洋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四號（昭和41年（1966年）3月），頁9-15。

²⁸ 〔日〕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0月），〈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頁95-98。

²⁹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2月），第二章第五節〈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及大眾教育的發展〉，頁30。

梳理印刷史料、版本著錄，取證傳世文獻，發現雕版圖書作為印刷傳媒，大抵有四大層面之目的和使命：其一，在朝廷，監本官刻本之使命，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其二，家刻本、坊刻本，期盼「布之四方，圖永其傳」；其三，就教育文化而言，雕版圖書更以「資鑑與致用，度人以金針」自許；其四，就中央集權，統一政教而言，對於書坊刊本，嚴格進行監控，實施看詳禁毀。由此觀之，宋代朝廷對於雕版印刷，一方面標榜崇儒右文，一方面實施看詳禁毀，一放一收，如物理學上之離心力和向心力，由此可見印刷傳媒自有其魅力與影響，而其接受與推廣，自有其目的性與使命感。³⁰

印本文化形成之後，相較於寫本、藏本，印刷傳媒之效應有何特殊處？對於宋元之文風士習，究竟生發哪些影響？筆者以為，印刷傳媒造就繆鉞所謂宋詩與唐詩風格之殊異，促成錢鍾書所謂「詩分唐宋」之文學事實；助長「唐宋變革」，促使「近世特徵」之呈現。此攸關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學界於此關注不多。³¹今思整合版本學、目錄學、印刷史料，以及宋元詩話、筆記、文集、題跋諸文獻，作較全面之考察。印刷傳媒之於宋元士人，是否如谷登堡（Gutenberg Johann, 1397? -1468）

³⁰ 筆者已別撰一文，名為〈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8年4月），頁171-210。

³¹ 有關印刷文化史之研究，管見所及，有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頁356-358；又，《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12月），〈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頁262-271；〔日〕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0月），〈印刷術的普及與宋代的學問〉，頁88-99。〔美〕露西爾·介（Lucile Chia）：《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思想家》II）（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留住記憶：印刷術對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頁486-498；〔日〕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東坡烏臺詩案」考——北宋後期士大夫社會中的文學與傳媒〉、〈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頁173-292。

發明活字版印刷術，於中古歐洲，改變了閱讀環境、影響了接受反應，加速古老變革，重組文學領域，徵存傳統典籍，催生創新體類？³²谷登堡活字印刷所引發之傳媒效應，筆者擬作為研究之對照與觸發，提出十大層面作討論：一、讀書撰述之昌盛；二、雕版圖書之監控；三、閱讀習性之改易；四、校讎學版本學之開創；五、規矩法度之講求；六、能入能出之提倡；七、詩話評點之崛起；八、文學體式之嬗變；九、經典研究之復興；十、學術風尚之轉變。上述層面，對於宋詩風格之形成，宋代詩學主題之論述，多有關聯。筆者曾草撰〈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一文，只評論讀書撰述之昌盛，閱讀習性之改易、校讎學版本學之開創。³³其他研究課題之開發，必須廣徵文獻，詳加論證，尚有待異日。

二、宋刊宋詩別集與宋詩特色

印刷傳媒之崛起與繁榮，究竟生發那些效應？這是印刷文化史研究之課題。對於宋詩特色之促成，筆者已發表若干論文，最近撰成《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一書，約33萬言，其中〈博觀約取與宋詩之學唐變唐〉、〈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二文，分別從宋刊唐詩選集、宋刊唐人別集，二方面作論證。本文則以宋刊宋人之詩集選集為議題，再論印刷傳媒對宋詩特色之推助，嘗試從接受反饋、反應回路之視角切入，參考傳播學理論，扣緊版本學、目錄學，以

³² [法]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 (Frederic Barbier) 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第六章，4、閱讀，頁132-133。

³³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照〉，提出三項論述：其一，閱讀精博，家能著書；其二，致力校讎，盡心版本；其三，印本易得，誦讀滅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80週年慶「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7)，頁1-26。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已接受刊登。

申說宋詩特色之形成與嬗變，進而論證錢鍾書「詩分唐宋」之命題。

鄧廣銘教授研究宋史，指出：宋朝之右文政策，「無非指擴大科學名額，以及大量刻印書籍等類事體」，要皆順應社會發展所已具備的條件，因勢利便而作出來的。³⁴圖書傳播的媒介，在魏晉六朝以來之寫本藏本外，又增添雕版印刷之印本圖書，創造了前所未有接觸書籍的機會，於是讀寫能力不斷提高，對知識傳媒之需求亦更加殷切，論者指出：「印刷術的發明及廣泛使用，無疑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態度的變遷」；³⁵所謂「變遷」，應是多方面的。就文學而言，閱讀心態、思維策略、創作方法、論述模式，以及語言、體製、風格，或皆因印刷傳媒而有所調整與改變。

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原為電子學術語，心理學、美學借用其說，標榜「反饋」、「反應回路」，以詮釋審美接受之歷程。所謂「反饋」(feed back)，原指控制系統輸出的信息，作用於被控對象後，產生的結果，再輸送回來，又稱為「回授」、「返回傳入」、「回復」。文藝美學借用控制論中因果相互作用的反饋聯繫，指稱審美對象的反應，又反作用於審美對象。³⁶時至宋代，圖書傳播之媒介，除寫本、藏本之知識流通外，又增加雕版印書之傳媒。印刷傳媒之圖書信息量如此豐富多元，傳播媒介如此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宋代士人面對如此創新之知識觸媒衝擊，於是深信讀書精博有益於作文；「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之論調，成為宋人文學創作之口頭禪。蘇軾〈稼說送張琥〉稱：

³⁴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頁71。

³⁵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鄧廣銘宋使職官志考證序〉，頁31。

³⁶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美學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10月），〈反饋〉，頁113-114；參考胡繩等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反饋〉，（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10月），頁196-197。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云：「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陳善《門蟲新話》謂：「讀書須知出入法」；嚴羽《滄浪詩話·詩辨》雖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然亦強調「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詩學理論主張如此，遂接受反應於詩歌創作及詩選文選中。

試考察編選刊行於宋末元初之《古文真寶》，前集卷一，開宗明義之選文，清一色選錄有關「勸學」之詩文，如〈真宗皇帝勸學〉、〈仁宗皇帝勸學〉、〈司馬溫公勸學歌〉、〈柳屯田勸學文〉、〈王荊公勸學文〉、〈白樂天勸學文〉、〈朱文公勸學文〉、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皇帝宰輔、騷人墨客，乃至於哲學家思想家，多勸勉勤學榮貴，提倡博極群書，〈王荊公勸學文〉所謂「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愚者得書賢，賢者因書利」四句，最能具體指陳讀書之效應與功利。³⁷蓋宋末元初印本圖書數量已超越寫本，成為圖書市場之主流，黃堅所編《古文真寶》，即是此一學風土習之如實反映。就反饋理論而言，詩人不斷根據效果來調整創作活動，於是在注重博觀厚積的氛圍中，宋人作詩而有以才學為詩者，有以議論為詩者，有資書為詩者，有破體為詩者，更有出位之思，橫跨詩、畫、禪、儒、道，合併重組，會通化成而為詩者。凡此，多與宋代圖書流通、印刷傳媒之快捷、經濟、便利、無遠弗屆息息相關，有可能即其反應回路。宋人作詩，經由學唐變唐之接受轉化歷程，固然有得於印本寫本傳媒之啟益；而新變自得，巍然成家，或撰成書稿，或付諸雕版，所謂學古通變、自成一家者，亦多為印刷傳媒，及圖書流通之反饋、回授。今試圖據此印刷傳媒之反饋，論述宋詩特色之生成。

依傳播接受之「反饋」理論，文集雕版與閱讀接受間，形成「反應

³⁷〔宋末〕黃堅選編：《古文真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朝鮮隆慶元年（1567）活字本，詳說大全本，2007年7月），前集卷一，頁14-17。選編者黃堅，當為宋末元初人，參看熊禮滙：〈《古文真寶》的編者、版本演變，及其在韓國、日本的傳播〉，參看《古文真寶》前言，頁1-6。

回路」；圖書之接二連三雕印，與讀者接受之廣泛息息相關。讀者之閱讀接受，又體現於詩歌創作與詩學論述上。詩歌創作彙成詩集，文藝主張集成詩話筆記，因應商品經濟講究供需相求，圖書出版憑藉當代審美品味，於是決定稿本抄本之是否付印；此之謂「反饋理論」，「反應回路」。宋詩大家名家之詩集，考諸版本著錄，每見諸本紛呈，琳瑯滿目，寫本、鈔本、藏本、印本多元流傳。試對照谷登堡（Gutenberg John，1397-1468）發明活字印刷，論者稱印刷書為15世紀「變革的推手」。當時成千上萬的中世紀手抄本，不可能立即全部印製成書，是以個中的取捨，成為當務之急。取捨存廢之選擇，取決於15世紀的品味與輕重緩急。東方之雕版印書從選書到付印，猶谷登堡之活字印刷：「書商基於暢銷和獲利考量，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往往列入優先考慮。」³⁸反觀東方中土宋朝，從眾多寫本藏本中選擇刊刻為雕版圖書，亦取決於當時士人之審美品味與商品經濟。宋人之學唐變唐，杜甫、韓愈、白居易詩集之寫本印本最可觀；宋詩特色之形成與發展，相關詩人別集之雕印刊刻，其中之消息盈虛，亦隨之抑揚上下。印刷傳媒於文學發展，可謂呼吸相通，影響相應。

印本圖書之流通，只是宋代諸多文學傳播方式之一。宋代文學傳播方式，大抵可分口頭傳播與書面傳播兩大類型。前者如宋詞、話本與雜劇；後者如詩、文、辭賦、四六，或以單篇傳播，或以書冊傳播。書面之單篇傳播，或以雕印，或以石刻，或以題壁；書冊之傳播，或以寫本（稿本、藏本、抄本），或出之以雕版印刷（印本）。³⁹圖書傳播之豐富多元，可以想見。就印本圖書而言，詩文別集之編定，無論自編或他

³⁸ [法]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n-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八章〈印刷書·變革的推手〉，頁261-262。

³⁹ 劉揚忠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八章〈宋代文學的傳播〉，頁389-417。

編，完成於當代或後世，編成後未必即付雕版。以稿本、藏本、抄本形式存在或傳播，為時久暫不一，短者二、三十年，長者或達百年。此時，或以單篇傳播，或以抄本流通，或以稿本典藏，猶六朝四唐之圖書傳播然。宋代詩文集由寫本而刻印出版，或自家雕印，或官府刊刻，或書坊雕版。自家雕印，不在營利，而在傳播久遠，擴大聲譽與影響。官府刊刻對象或自家祖先，或鄉紳名流，有表彰賢德之意。若書坊雕版，則無論邀稿或投稿，必斟酌學風士習，權衡審美品味，最具商品經濟之指標。本文所論宋詩體派之流衍，與圖書傳播之消長，當作如是觀。

清代蔣士詮〈辯詩〉曾感歎：「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⁴⁰，雖則如此，宋人學唐變唐，自成一家者，亦多有之，北宋如王禹偁、蘇舜欽、歐陽脩、邵雍、王安石、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南宋如陳與義、楊萬里、陸游、范成大、朱熹、劉克莊、戴復古諸家，其詩集或手自編訂，生前雕印，啟發沾溉當代；或後人纂成，身後刊行，影響接受無窮。雕版印書，化身千萬，無遠弗屆，頗便於圖書之流通，以及知識之傳播；相較於藏本、寫本對文化事業之貢獻，真不可以道里計。今以上述十六家為例，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⁴¹、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⁴²，論述諸詩集之雕版刊行概況；從詩集之傳播接受，頗可推知宋詩之發展與嬗變。

下列各章節列舉若干宋詩之大家名家，及重要詩派，蓋就現今文學史經見者為準，以便沿波討源，提供考證。至於現今所稱大家名家，當時或未必獲得品題或稱數，則暫不討論。傳世之宋人刊本中，或為家刻，或為官刻，或為坊刻，故並非皆為大家名家，或重要體派，職是之故。為便於論述問題，暫依宋詩發展之歷程，分為五項：（一）宋詩特色之

⁴⁰ 蔣士詮：《忠雅堂詩集》（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10月），卷十三，〈辯詩〉，頁196-197。

⁴¹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

⁴²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

先導；（二）宋詩宋調之建構；（三）江西詩風之嬗變；（四）理障理趣之消長；（五）宋調之變奏；要之，宋詩之發展與流變，大抵與印刷傳媒相互作用、交相觸發：

（一）宋詩特色之先導

宋詩特色之形成，肇始於宋初諸賢疏離三體，新變詩歌題材內容，開發唐詩遺妍。宋初王禹偁，跳脫唱和詩，而宗法白居易、杜甫之詩，為宋詩之宗法唐詩定調。蘇舜欽推動詩文革新，詩歌語言講究創新奇崛；詩風或追求避熟就生，突破成規，為宋詩超常越規、推陳出新作示範。梅堯臣詩風崇尚平淡，蔚為宋詩主體風格之一；作詩主張意新語工，促成宋詩學唐變唐之主要訴求之一。⁴³諸家之詩風與版本之刊刻，簡述如下：

1. 王禹偁《小畜集》、《小畜外集》

宋初詩壇，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禹偁（954-1001）「主盟一時」（蔡居厚《蔡寬夫詩話》）。王禹偁曾云：「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下開有宋詩人學杜、學白之風氣。林逋稱：「縱橫吾宋是黃州」；吳之振「《宋詩鈔》稱其「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考之版本，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1147），沉虞卿將王禹偁生前編定之《小畜集》三十卷付梓，是為黃州刻本，金人蓋嘗翻刻。其《後集詩》三卷、《小畜外集》二十卷，《小畜外集》北宋末刻本尚存留三分之一，南宋沈虞卿黃州刻本今亦有三分之一殘本傳世。《小畜集》之傳播，見於宋人書目著錄者，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十九之《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之《王元之小畜

⁴³ 參考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章第一節，頁5-10；第二章第二節，頁59-71。

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之《小畜集》三十卷。⁴⁴

2.蘇舜欽《蘇子美集》

蘇舜欽（1008-1049）於寶元、慶曆間有詩名，筆力奔放豪健，以超邁橫絕為奇，其詩之冷峻沈鬱、雄奇悲壯尤為歐陽脩所推許。與穆修、歐陽脩、梅堯臣等往來唱和，反對西崑，革新文體，與梅堯臣齊名，合稱蘇梅、或梅蘇。清葉燮頗尊崇之，以為開宋詩一代之特色。⁴⁵有《蘇子美集》十五卷，為南宋孝宗乾道辛卯（1171）施元之三衢刻本。⁴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十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均著錄蘇舜欽文集，為《滄浪集》十五卷；《宋史》卷二〇八〈藝文七〉，則著錄《蘇舜欽集》十六卷。南宋呂祖謙《宋文鑑》、鄭虎臣《吳都文粹》，元方回《瀛奎律髓》選詩，蘇舜欽詩均有入選。觀其刊本寫本之多，選本之入圍，從可推其流傳之盛。

3.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

梅堯臣（1002-1060）追求「文質半取，風騷兩挾」之文學傳統，力倡平淡深遠之詩美，對於促成宋詩平淡美境之形成，頗具意義。明道元年（1032），歐陽脩曾鈔寫《梅聖俞詩稿》，謝景初曾編纂《梅堯臣詩集》十卷，其後，歐陽脩亦編選《梅堯臣詩集》十五卷，歐陽脩〈梅聖俞墓誌銘〉稱：「其文集四十卷」。上述四種本子雖未傳世，然至哲宗元符間，已有刻版流傳，南宋時又有《外集》、《別集》流傳。紹興十年（1140），宣州知州汪伯彥重新鏤版印行《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紹

⁴⁴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小畜集》，頁27-32；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王禹偁集》，頁23-27。

⁴⁵ 傅平驥、胡問濤：《蘇舜欽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3月），〈前言〉，頁21-25。

⁴⁶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五，《蘇學士文集》，頁193-194；又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蘇舜欽集》，頁114-115。

興本)，宋代書目著錄梅堯臣詩集，多作六十卷本，《宋史·藝文志》亦然。今所見傳世最早之本子，當為嘉定十六年(1223)殘宋本，（嘉定本存三十卷）。從上述版本之編纂雕刻印狀況，亦足推詩壇接受，詩風流布之大凡。⁴⁷

（二）宋詩宋調之建構

宋詩所以異於唐詩，宋調所以不同於唐音，主要由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先後管領風騷，次第建構完成。元袁桷〈書湯西樓詩後〉謂宋詩有三宗：「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臨川之宗。氣盛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⁴⁸王安石為學唐有成，開宋有功之人。唐聲唐音既衰，於是蘇軾、黃庭堅二宗獨盛，引領風騷，蔚為宋詩之主體特色。其中消長，圖書傳播以及印刷傳媒有如響斯應之體現：

1.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脩（1007-1072）師法韓愈、李白。作詩以格為主，一洗西崑浮豔詩風，語言平易，情韻深長，致力擺脫凡近，盡心自出手眼，推動詩文革新運動，為北宋中葉文壇領袖，開宋代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風氣。宋詩至歐公，波瀾始大，逐漸而自成一家。

歐陽脩詩文集，除其子歐陽發編定稿，及歐陽脩手訂集外，兩宋尚有編集多種，在各地廣為流傳，《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所謂「其集遍

⁴⁷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三《宛陵先生文集》，頁138-141；又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九《梅堯臣集》，頁60-63。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註》（台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4月），敘論三〈梅堯臣集的版本〉，頁47-50。

⁴⁸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203，卷四十八，〈書湯西樓詩後〉。

行海內，而無善本」：如《歐陽文忠公集》八十卷，《廬陵歐陽先生集》六十一卷，《歐陽修集》五十卷，《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等等，至周必大用諸本編校，始有《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刊行。其他，則據稱：汴京官局、閩、綿州、吉州、蘇州、衢州、杭州亦皆有刻本行世。⁴⁹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跋語稱編刊之作用：「既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鑿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為文之法」，神交古人，開卷有益，知識傳媒之效應，可見一斑。由此觀之，詩集版本之多寡，流傳之遠近，與詩人成就之高下，影響力之大小，皆有相互對應之關係。文獻學與文學之整合研究，當於此中開展論題。

2.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王荊文公詩李壁注》

王安石（1021-1086）詩學杜甫、韓愈，晚年尤喜唐音而究工拙。王安石詩受歐陽脩影響，多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尤重練意、工下字、好集句，長於點畫詩句以為詩，凡此，皆宋詩，尤其是江西詩之習氣與特色。荊公提倡明而不華、平淡自然之詩風。晚年論詩，主張韻味；詩歌創作，約一千五百餘首，為宋詩之巨擘。後人許為「東京之子美」，足與梅、歐並駕、蘇黃比肩。其詩《滄浪詩話·詩辯》稱為「王荊公體」。

北宋徽宗時，薛昂、王棣先後編定《臨川先生文集》。至南宋，《王安石文集》在高宗紹興年間，刊刻多次：有閩刻本、浙刻本，又有詹太和撫州刻本（即重刊《臨川文集》，又稱臨川本），廬州舒城《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刻本（原本，又稱龍舒本，今尚存兩種殘帙）。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珣重新刊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是為杭本（遞修本）。另外，宋刊尚有眉山杜仲容紹興刻本《大成集》，及一百六十

⁴⁹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一一《歐陽修集》，頁86-91。

卷本宋刊《臨川集》。⁵⁰《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宋代前後刊刻三次：嘉定七年（1214）最初刻本，嘉定甲申（1224）撫州刻本，理宗紹定三年（1230）庚寅增注本。⁵¹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南宋初年刊本《王文公文集》殘本，存七十卷。荊公詩喜好議論，傷於直率，妙於用事，以文為詩，追求工巧，宋詩宗風多有傳承者。今觀兩宋寫本、編本、刊本之多方多樣，於當代詩壇影響，豈可小覷？

3. 蘇軾《東坡集》、《王狀元集注東坡詩》、施顧《注東坡先生詩》

蘇軾（1037-1101）存詩二千九百餘首，詩思奔放、想像豐富，筆力雄健，議論風發。無論敘事言理，體物寫情，皆「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化俗為雅，以故為新，於唐詩風格多承傳，於宋詩多所創發與開拓；後人稱宋詩「取材廣，命意新」，蘇詩最足當之。蘇詩兼擅各體，尤長於古體與七言歌行，七律七絕亦精美明快，為北宋詩文革新之集大成者。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稱：「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蘇軾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對於宋詩特色之建構，宋調之促成，為最重要之關鍵人物。

蘇軾才高名大，詩文落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烏臺詩案期間，御史臺嘗用《元豐續添蘇子瞻錢塘集》三卷羅織罪名，指稱：「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世者甚眾，今獨取鏤版而鬻於世者進呈」，可見蘇集已板行流傳。⁵²蘇轍曾奉使契丹，

⁵⁰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七《臨川先生文集》，頁316-330；又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一七《王安石集》，頁156-167。

⁵¹ 《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刻朝鮮活字本，1993年12月），王水照於出版〈前言〉，論及「李壁注本的版本系統」，頁3-6。

⁵² 朋九萬《烏臺詩案》〈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四川大學中文系主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上編，頁580。內山精也：〈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新宋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

所作〈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其三云：「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七載：張舜民使遼，有范陽書肆刊刻《大蘇小集》，可見雕版印刷之無遠弗屆，流傳廣遠，《蘇集》於蘇軾生前已流傳至契丹遼國矣。崇寧大觀間，朝廷禁元祐學術，或竊攜《坡集》出城犯禁（《梁溪漫志》卷七），或甘冒不韙傳閱蘇軾文集（《續資治通鑑》卷八），蘇詩「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禁愈急，其文愈貴」。其間，書商又覷定有利可圖之商機，刊刻《蘇集》謀利。蘇軾自述：「賈人好利，每取拙文刊刻市賣」（《甌北詩話》卷五），符合商品經濟，供需相求原理。蘇軾為北宋最有讀者魅力之文學家，無論生前或死後，詩文集經傳鈔，編輯刊刻者極多。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稱：「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明代重刻南宋刊本《重編東坡外集》，著錄傳世之蘇軾文集凡二十四種：《南行集》、《岐梁集》、《錢塘集》、《超然集》、《黃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黃岡小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真一集》、《岷精集》、《掖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東坡前集》、《後集》、《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東坡遺編》。其他，尚有契丹所刻《大蘇小集》、《汝陰唱和集》、京師印本《東坡集》、陳慥所刻《蘇尚書詩集》等等。⁵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當坡公無恙時」，《東坡文集》杭本「已行於世」。至南宋，士人以「家有眉山之書」為榮。刊刻本又有《東坡七集》、《東坡別集》、《東坡外集》之目。要之，蘇軾文集流傳後世者，主要為《東坡七集》之版本系統。有關注釋蘇詩之刊本，宋代大抵有八種：趙夔類注本、吳興沉氏注本、漳

月），第一輯，頁258-261。

⁵³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章第六篇〈蘇軾著述生前編刻述略〉，頁62-75。

州黃學皋補注本、宋刊五家注、宋刊五注與十注拼合本、舊題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本、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本、廖群王瑩中注本。

今傳世東坡詩注本凡三：一為集注本、二為類注本、三為編年注本。日本所藏宋刊本蘇軾詩文集，度藏於宮內廳書陵部、內閣文庫、金澤文庫者，尚有殘本兩種，⁵⁴可謂琳瑯滿目，洋洋大觀矣。衢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稱蘇軾「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五稱：「蘇詩衣被天下，刻本叢雜」；蘇詩之傳播方式，除刻本外，尚以刻石、稿本、題贈、傳鈔、歌唱、詩話、筆記引錄，總集選錄諸形式流傳當代，影響來茲。⁵⁵嘗試考察《全宋詩》、《全宋文》、《全宋筆記》，梳理相關之書信，題跋，搜尋其中之讀書詩及閱讀文獻，覆按宋人藏書目錄、諸史藝文志著錄，將不難得知蘇詩之編輯、刊刻、傳播、接受之大凡。

4.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山谷外集詩注》、《山谷別集詩注》

黃庭堅（1045-1105），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猶唐詩之有李杜。所作「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創立江西詩社宗派。作詩主張學古通變，追求自成一家，以「少入繩墨」為初階，以「不煩繩削而自合」為極致，提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以古為新諸詩法，於「菁華極盛，體制大備」之唐詩之後，兼顧傳承與開拓，極力新變代雄，

⁵⁴ 參考同前註，第二章第二節〈家有眉山之書——南宋蘇軾著述刊刻述略〉，頁118-138。又，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九《東坡集》，頁401-421；卷十《注東坡先生詩》，頁451-465；劉尚榮：《蘇軾著述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1-131。嚴紹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沈》（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頁53-56。

⁵⁵ 王友勝：《蘇軾研究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5月），第二章〈宋人對蘇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頁28-33。

於是注重詞句之排列，意象之組合、修辭之運用、技巧之精化，由於有法可循，有門可入，於是天下風從，號為「黃庭堅體」。⁵⁶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稱：「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詩派。」可見其影響。

黃庭堅中年時，嘗自編詩文《焦尾集》、《敝帚集》、《退廳堂錄》，惜未傳於後。今所傳《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乃山谷外甥洪炎所編，於高宗建炎二年（1128）胡直儒刊本。三十卷本時有去取，故又有李彤編《外集》十四卷，諸孫黃瑋編《別集》二十卷。黃庭堅傳世之詩文，多彙集於上述三集之中。山谷集之宋刊本存於今、較完整而具特色者，當屬南宋乾道間劉仲吉編刻麻沙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又有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南宋孝宗間刊本《豫章黃先生文集》殘本存十六卷，《外集》殘本存六卷，以及內閣文庫藏宋刊本《豫章先生文集》殘本存十二卷，《外集》殘本存十一卷。其他傳本亦夥，魏了翁〈黃太史文集序〉稱山谷黃公之文，「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申）又欲刻諸郡之妙墨亭」，南宋時猶有閩坊本、延平本、閩憲本，可見傳本之多。⁵⁷宋人注宋詩，自蘇軾、黃庭堅二家始；王雲、任淵、洪炎、黃瑋，合稱「黃注四大家」。《四部備要》本《山谷詩集注》黃埈跋文所謂：「先太史詩編，任子淵為之集注，板行於蜀」，時當紹定五年（1232）左右。任淵又編纂《山谷精華錄》八卷而注之，原本已逸。史容作《山谷外集詩注》七卷，有嘉定元年（1208）眉山刻本；史容續作補充修訂，孫史季溫於淳祐十年（1250），於福州重刊，史季溫

⁵⁶ 張高評：《宋詩三百名家評傳——北宋詩人八十三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1-H0301-006-05）報告，頁144-145。

⁵⁷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十一《豫章黃先生文集》、《山谷黃先生大全文集》，頁502-525。參考劉尚榮：〈《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初探〉，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頁214-224。嚴紹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沈》，頁83-85。

又作《別集》注二卷。其他，為黃詩作注者，尚有陳逢寅、楊氏等人。就宋代書目而言，黃庭堅詩文多見著錄，如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讀書附志》、《宋史·藝文志》，寫本印本互有詳略。就雕版印刷之地域分佈言，確切地點涉及四川、江西、福建、浙江。南宋後，黃庭堅詩文集版本繁多，除《內集》、《外集》、《別集》三編、任淵、史容、史季溫注本外，又有《江西詩派》、《蘇門六君子集》、《四學士文集》、《黃陳詩集注》諸本。⁵⁸

尤其是江西詩派，以黃庭堅為宗，自哲宗元祐以來，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江西詩風流行天下，前後約一百餘年，可謂興盛矣。南宋張戒、劉克莊、嚴羽探討唐宋詩之異同、較論唐宋詩之優劣，下開明清唐宋詩之紛爭，往往以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為宋詩末調之代表。今知悉黃庭堅詩集之編纂、刊刻、著錄之大凡，當有助於了解山谷詩之接受，及江西詩風之消長。

（三）江西詩風之嬗變

自哲宗元祐二年（1087）「黃庭堅體」形成，以詩法為天下倡，於是天下風從，縱橫南北宋。至南宋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山谷以下，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略云：「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並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蘊矣。」其後，法席日盛。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小序·山谷》亦推尊黃庭堅：「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宜祖。」⁵⁹稱黃庭堅為「本朝詩家宗祖」，而以歐陽脩、蘇軾為「大家數」，兩相比較，山谷及其詩派所倡詩法，

⁵⁸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二一《黃庭堅集》，頁196-204。

⁵⁹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64）卷十三，頁396；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頁478。

所作詩歌，更具宋調之本色當行，故最為宋詩代表。

江西詩派非盡出江西，而大半出江西；非盡祖山谷，而氣味皆似山谷。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所謂：「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⁶⁰於是參酌梁昆《宋詩派別論》，選擇陳師道、陳與義、范成大、楊萬里、陸游五家，論述其圖書傳播與印本傳播之大凡：

1. 陳師道《後山居士集》

陳師道（1053-1102），詩學黃庭堅，兼學王安石，欽仰蘇軾，宗法杜甫，名列「蘇門六君子」、〈江西詩社宗派圖〉中，方回《瀛奎律髓》標榜一祖（杜甫）三宗，陳師道與黃庭堅、陳與義並列為三宗，足見其詩學地位。作詩追求新奇、陌生化，頗致力樸、拙、粗、僻之美，然洗剝凝煉太過，遂成生硬晦澀。詩由「閉門覓句」之苦吟來，其佳者每有枯淡瘦硬之妙。

陳師道詩文集，最初由門人魏衍編定，凡二十卷，《直齋書錄題解》卷十七所謂「《後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是也。知當時「蜀本」陳集，詩六卷，文十四卷。另外，又有十四卷劉孝躋臨川刻本、《汝陰唱和集》一卷（在江西刊刻《江西詩社宗派詩》中）。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著錄「紹興二年（1132）謝克家所敘」之紹興刻本，今仍有完本傳世，舊稱「宋蜀刻大字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善本叢書》中）。至於《後山詩注》傳世之宋刻本，最少尚存三種，可惜都是殘卷。任淵《後山詩注》六卷，傳世之宋本，分為上下者，仍稱六卷本；有每卷拆分為二者，則成十二卷本；後世傳本都是十二卷本。⁶¹從版本之分合多元，蜀本、江西本、紹興本之地域分佈，可略知後山詩在南北宋之流傳

⁶⁰ 辛更儒點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卷七九，〈江西宗派詩序〉，頁3230。

⁶¹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二三《陳師道集》，頁235-239。

與接受。

2. 陳與義《增廣箋注簡齋詩集》、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

陳與義（1090-1138）作詩，「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方回《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列陳與義為江西詩派三宗之一；其詩之「忌俗」，「不可有意用事」，近似江西詩風；然平生所求詩境，在衝口直致、淺語入妙，與江西詩派之標榜「蒐獵奇書，穿穴異聞」，迥不相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列有「陳簡齋體」，謂「亦江西之派而小異者」，值得參酌。⁶²

陳與義詩集最早之刻本，為紹興七年（1137）周葵吳興刊本《簡齋集》二十卷。最先為陳集作注者，為南宋光宗紹興間之胡穉，著《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又有《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注》十五卷，為劉辰翁評點，陸心源訂為宋麻沙本。據評點本所引，南宋時陳詩除胡箋本外，尚有武岡本、閩本、及簡齋手定本。另外，又有元鈔本《簡齋詩外集》一卷，存古今詩五十二首，文三篇，皆胡箋本所無。⁶³就版本之種類言，有詩集，有箋注，有評點；有手定本、舊鈔本、刊刻本；時代從紹興、經紹熙、至元代，多可窺見陳與義詩集之流傳，與各時代讀者之可能接受。

3. 范成大《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1126-1193），詩風清新溫潤，典雅標致，《四庫提要》稱其「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為一家」。所作〈四時田園雜興〉，為世所傳誦，為古代田園詩之集大成者。周必大〈賢政殿大學士贈銀青

⁶² 白敦仁箋校：《陳與義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前言〉，頁2-3。

⁶³ 鄭騫：《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年10月），〈序〉，頁1-3；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第十七《增廣箋注簡齋詩集》、《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頁820-827。

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稱石湖「尤工詩，大篇短章傳播四方。初倣王筠一官一集，後自哀次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初，范成大自桂林入蜀，「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陸游為之刊刻行世。紹熙四年（1194），范成大逝世之次年，楊萬里為《石湖集》作序，謂石湖《全集》，乃晚年手自編定。嘉泰三年（1206），《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家刻本刊成。《宋史·藝文志》著錄《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當即范莘等所刊家刻本。⁶⁴

4. 楊萬里《誠齋集》

楊萬里（1127-1206），與陸游、范成大齊名，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楊詩初學江西派，後學王安石絕句，繼學晚唐人絕句、最終學古通變，注重活法妙悟，於是「萬象畢來，獻余詩材」。誠齋詩與陸游、范成大相較，內容新鮮風趣，追求藝術獨創，尤其是山水詩，其手法宋人推崇為「死蛇活弄」、「生擒活捉」；近人直喚作「真率性靈的代面」。⁶⁵

楊萬里生前，曾自編其詩為八集，《宋史·藝文志》即分集著錄，凡詩集九種：即《江湖集》十四卷、《荊溪集》十卷、《西歸集》八卷、《南海集》八卷、《朝天集》十一卷、《江西道院集》三卷、《朝天續集》八卷、《江東集》十卷、《退休集》十四卷，共八十六卷。楊萬里去世後兩年，長子楊長孺於嘉定元年（1208）編成《誠齋集》，於端平元年（1234）刊刻於江西。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端平初年刊本《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目錄四卷（其中十卷鈔配），收錄楊萬里詩文著作，此本最為齊全。每卷後均署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端平元年

⁶⁴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二十，〈石湖居士詩集〉，頁979-981。

⁶⁵ 錢鍾書：《宋詩選註》（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年11月），〈楊萬里〉，頁216-221；蕭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七章第三節〈真率性靈的「代面」〉，頁159-167。

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字樣。《四部叢刊》初編所據藝風堂影宋本，即其傳本。宮內廳又藏有淳熙本《誠齋先生南海集》八卷，各集皆劉煒叔端平二年（1235）家刻本，今北京圖書館藏有淳熙至紹熙遞刻單集本，凡七集，又有淳祐丁未（1247）年刻本，明汲古閣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即其流衍之傳本。另外，見於岳珂《程史》述《朝天序集》，尚有福建麻沙刻本。⁶⁶

除雕版印刷外，誠齋往往以詩集寄贈友人，如張鎡有〈誠齋以《南海》《朝天》兩集詩見惠因書卷末〉，姜特立有〈謝楊誠齋惠長句〉、陸游有〈楊廷秀寄《南海集》〉、〈謝江東漕楊廷秀秘監送《江東集》〉、周必大有〈奉新宰楊廷秀攜詩訪別次韻送之〉；詩集因寄贈而傳鈔，因傳鈔而有寫本藏本，如姜夔有〈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袁說友有〈題楊誠齋《南海集》二首〉、項安世有〈題劉都監所藏楊秘監詩卷〉、趙蕃有〈雪中讀誠齋《荊溪》諸集〉、韓淪有〈楊秘監《江東集》〉；⁶⁷印本之外，稿本、寫本、鈔本、藏本之多元呈現，足見楊萬里諸詩集傳播、流衍，與接受之大凡。

5. 陸游《劍南詩稿》

宋室南渡後，當時稱大家者，必以陸游（1125-1210）稱冠。劉克莊曾謂：「放翁學力似杜甫」；又稱：「南渡而下，放翁故為一大宗」；朱熹〈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今觀其詩，取材廣，命意新；且記聞博、善用典、工對仗，而又不失樸質清空；學晚唐，又重平淡；以曾幾為師，卻又「不嗣江西」；

⁶⁶ 辛更儒點校：《楊萬里集箋校》第十冊，〈附錄二·補遺〉，「書後」，頁5313-5315。又，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二十《誠齋集》，頁991-994。

⁶⁷ 湛之（傅璇琮）編：《楊萬里范成大卷·楊萬里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頁2-19。

注重學古通變，更標榜「詩外工夫」。⁶⁸

陸游詩集《劍南詩稿》，宋代刊本有前集，有續稿，前集由放翁生前自定，淳熙十四年（1187）刻於嚴州郡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之《劍南詩稿》二十卷本，即此是也。《書錄解題》又著錄《續稿》六十七卷，為幼子子適復守嚴州時所續刻，時在寶慶紹定間（1226-1229）。《書錄解題》又著錄《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當是嚴州前後二刻之總稱。嚴州本《劍南續稿》刊印前十年，陸游長子子虞於嘉定十三年（1220）刊印《劍南詩稿》八十五卷，《遺稿》七卷，刻於九江郡齋，是為江州刻本。江州刻本八十五卷，陸子虞〈跋〉語稱，係奉父命編次，「（先君）親加校定，朱黃塗攢，手澤存焉」，可視為作者生前手定。宋嚴州所刊二十卷本、江州所刊八十五卷本，皆存殘本，今存北京圖書館。另有宋羅椅《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劉辰翁《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收入《四部叢刊》中；方回《瀛奎律髓》亦多所選錄，明劉景寅抄出而成《別集》。⁶⁹從刊本之雕印，選本之流傳，足見「陸先生《劍南》之作傳天下」之盛況。

（四）理障理趣之消長

宋代道學，一名理學，或稱宋學，起於北宋五子，而集大成於朱熹。朝廷崇儒右文，故道學執宋代學術之牛耳，一切學術、政治、文學、文化，無不受道學之影響。詩歌為文學之一支，道學家自有其詩集與詩歌，惟「詩有別材、別趣」，雖非關道學之窮理，然道學家作詩，不離本色者，是為理障；跳脫道學，富於詩歌語言，不異騷人墨客之吟詠者，是為理趣。詩篇抽象化、概念化、邏輯化，較不合形象思維者，往往墮入

⁶⁸ 錢鍾書：《宋詩選註》，〈陸游〉，頁230-234；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第七章第二節〈陸詩的思想和藝術〉，頁322-323。

⁶⁹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前言〉，頁8-9；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第二十《劍南詩稿》，頁960-963。

理障，僧尼道士之悟道詩亦往往而有，實不祇於道學家。為篇幅所限，作詩用邏輯思維而陷入理障者，以邵雍為代表；詩篇多形象思維，富含詩歌語言者，亦只擇朱熹一家。列述其圖書傳播與印本傳播，以見此中之大凡：

1. 邵雍《伊川擊壤集》

邵雍（1011-1077）作詩，主張「因言成詩，因詩成音」，重視自然清新，不事雕琢，《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脫然於詩法之外」。嚴羽《滄浪詩話》將此種不拘聲律、隨興抒寫、吟詠情性、得自然之趣者，稱為「邵康節體」，於宋詩之平易自然，頗有影響。而詩涉理路，以論理為本，以修辭為末，《擊壤集》可作代表。所謂「無格調、寡性靈，刊落詩之情趣，而移殖以理道」，徒見理障，少有理趣者，此集有之。⁷⁰

邵雍曾手編《擊壤集》，收古律詩二千篇，都為十卷，十卷本久佚。北宋英宗治平丙午（三年，1066），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曾刊《邵子擊壤集》、《內集》十二卷、《外集》三卷。⁷¹1975年江西星子縣宋墓出土兩部殘宋本，一為《邵堯夫先生詩全集》，存一至九卷；一為《重刊邵堯夫擊壤集》，僅六卷，蓋靖康時刊本。其他，見於宋代書目者，尚有全本兩部、大字本、舊稱宋本、殘宋刊本多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稱其歌詩「盛行於時」，傳世之宋刊本多種，可以想見圖書之傳播流行，「邵康節體」之接受移化。⁷²

⁷⁰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10月），《擊壤集提要》，頁3046。梁昆：《宋詩派別論》，〈理學派〉，（台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5月），頁131。

⁷¹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12月），卷三，〈宋私宅家塾刻書〉，頁176。

⁷²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五《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頁227-235。

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朱熹（1130-1200）早歲本號詩人，其後方學道名家。南宋胡銓曾以「能詩」推薦朱熹，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謂「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稱揚朱熹「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以為足與陸游匹敵。陳衍《宋詩精華錄》卷三評價朱子山水詩，以為「道學中最活潑者，然詩語終平平無奇」，較欣賞「寓物說理而不腐之作」。論者稱朱子詩，雖「以才學為詩」，然「不墮理障」。世人以詩人之詩衡量理學詩派，朱子詩往往深獲好評，為理學家中最無道學氣者。⁷³

朱熹生前，文集已有編輯，且刻於建陽麻沙。其後文集之編定及版本之演變如下：紹興四年（1193），朱熹自編《晦庵朱先生大全文集》前集十二卷、後集十八卷，為《天祿琳瑯書目》所著錄，向為藏書家寶重，視為善本秘籍。其後嘉定五年（1212），朱在編《文集》《前》《後》集八十八卷；嘉定十一年（1218），黃士毅類編刻朱子《文集》一百五十卷；嘉熙三年（1239），潛齋王野編刻《文集》一百卷（浙本）；淳祐三年（1243），實齋王遂編刻朱子文集《正集》百卷，《續集》十卷；淳祐十年（1250），徐幾編刻《文集》正集百卷，《續集》十一卷；景定四年（1263），余師魯編刻《文集》正集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南宋末年，新安朱氏後裔編刻《文集》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集，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要之朱子《文選》之編刻，演為三大系統：一為徽本系統，朱子自訂三十卷本；二為閩本系統，朱自在所編八十八卷本；三為浙本系統，即王野編刻之百卷本。⁷⁴

朱熹之學，遠紹孔孟，近承北宋五子，融合佛道，集理學之大成，

⁷³ 呂肖奐：《宋詩體派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7月），第九章第二節〈邵雍與朱熹〉，頁285-297。

⁷⁴ 參考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四編〈朱熹文集編集考〉，頁561-572。

創立閩學（考亭學派）。考察宋代朱子文集之刊本，如是之多元；雕印之頻繁，顯示閱讀需求者眾，其影響之深遠，自然可知。

（五）宋調之變奏

江西詩派之習尚，初學唐詩，宗法唐音，似與四靈詩派不異。試研讀《江湖小集》、《江湖後集》，可見江湖詩人企圖體現「唐人風致」之努力。唯江湖詩人群體龐雜，如陳造、敖陶孫、劉過、姜夔、鞏豐、劉翰等，皆曾追隨江西詩派，作詩從江西詩派入；如姜夔（1155？-1209），即是跳脫江西，而汲取唐音，終致自成一家者。

再如戴復古，亦是出入杜甫與黃庭堅之間，則晚年詩風之深妙老健，亦近江西。劉克莊早年學四靈，對江西詩派多所批評；後撰〈江西詩派小序〉，對江西詩派又推崇備至，所謂「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歟？清吳之振《宋詩鈔·後村詩鈔》引論者曰：「江西苦於麗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又能變化而活動。蓋雖彙眾作，而自為一宗者也。」⁷⁵江湖詩人戴復古、劉克莊二家，大抵從江西詩法入，而又會通諸家，出其所得者，是謂宋調之變奏。其圖書流通，版本傳播，亦略述如次：

1. 戴復古《石屏詩集》

戴復古（1167-理宗淳祐間），曾學詩於陸游，而受四靈影響，崇尚晚唐，「以詩鳴東南半天下」。論詩主獨創，詩風尚雄渾。吳子良〈石屏詩後集序〉評其詩，以為兼含清苦、豐融、豪健、閑放、古淡、工巧而有之；趙汝騰、包恢亦稱美其詩，以為尚理、精工、流麗、味遠、沖淡、警策、尚志、貴真、新奇、妥帖，蓋其詩清健輕快，兼備眾體，俊

⁷⁵〔清〕吳之振：《宋詩鈔》（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4月），〈後村詩鈔〉，頁451；參考呂肖奐：《宋詩體派論》，第八章〈江湖詩派：宋調的變異〉，頁209-210。

爽天然，自成一家。其從孫戴昺〈石屏後集鈔梓敬呈屏翁〉稱戴復古詩：「妙似豫章前集語，老於夔府後來詩」，以為介於杜甫與黃庭堅之間，則近江西詩風可知。故清陳衍《宋詩精華錄》推崇其詩，以為「晚宋之冠」。⁷⁶戴復古與劉克莊，並稱江湖詩人之英傑。

戴氏《石屏詩集》，宋代曾多次編選刊行，前文述及戴昺〈石屏後集鈔梓敬呈屏翁〉，即其中之一。明弘治時馬金〈書石屏詩集後〉曾略述《詩集》於南宋編選流傳之概況，謂「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類多閔時憂國之作。同時趙蹈中選為《石屏小集》，袁廣微選為《續集》，蕭學易選為《第三稿》，李友山、姚希聲選為《第四稿》上下卷，鞏至仲仍為《摘句》。又有欲以其詩進御而刊置郡齋者。」時在端平三年（1236），《石屏詩集》已「併入梓以全其璧」；且《石屏詩全集》「紹定間已板行」，殆即刊置郡齋，為樓鑰、吳子良等所刊者⁷⁷。戴復古《石屏詩集》於宋季刊行之多，由此可見。

2.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1187-1269）詩，今存四千餘首，江湖詩派代表，號稱「南渡之翹楚」。清代葉矯然《龍性唐詩話》卷五，以為詩歌成就可與陸游、楊萬里相當。其所以自成一家者，要在學古通變，擇善而從，不拘一格，故能度越流輩。其〈瓜圃集序〉自述學習唐宋家數歷程：「初余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手抄口誦」，於是出入於唐宋之間，而歸於宋調之「才學為詩」。其詩有江湖詩派之平易，又不失典雅，職是之故。

⁷⁶ 張高評：《宋詩體派敘錄》，〈戴復古〉，（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2-0301-H-006-015），頁154-156。

⁷⁷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二十四，《石屏詩集》，頁1223-1224。又金芝山點校：《戴復古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書考〉、〈序跋〉，頁320-336。

劉克莊早有詩名，其《南嶽詩稿》刊入陳起《江湖集》中，因「江湖詩禍」毀版失傳。⁷⁸其後，詩文稿陸續彙編為四集，洪天錫作劉克莊〈墓誌銘〉稱：「（《後村居士集》）《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巋然為一代宗工」；《前集》，乃林希逸於淳祐九年（1249）所刊，即日本靜嘉堂所藏宋刊宋印本；後村《後集》、《續集》、《新集》，林希逸於咸淳六年（1270）作〈後村大全集序〉時，已稱「此書（三集）流傳遍江左矣」。至於彙刻諸集而成《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則由季子山甫（季高）合成巾箱家刻本。惜此本宋槧全帙久已失傳，明代范氏天一閣曾度藏影宋綿紙藍絲鈔本，後歸日本靜嘉堂。除山甫家刻本《大全集》外，又有《後村先生詩集大全》，未知確切卷數，今上海圖書館藏有《詩集大全》殘本十一卷（卷一至四，九至十五）應是大全集另一系統。咸淳八年（1272），劉希仁作〈大全集序〉時，略述《大全集》於南宋末年刊刻流傳情形：「後村以文章名天下，有《前集》刊於莆，既而《後》、《續》、《新》三集復刊於玉融，四方□□。板為書坊翻刻，而卷帙訛繁，非巾箱之便。」當時書坊有翻刻本，錯亂漏略嚴重，幾成毀板公案。⁷⁹雕版流傳，致書坊為牟利翻刻，就市場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推之，可知後村詩文廣受青睞愛賞之一斑。

三、宋人選刊宋詩與宋詩體派之流行

自《昭明文選》以來，選本成為文學批評體式之一。選集欲汰劣以存優，批評欲貶劣而褒優，所以選集和文學批評標準有相通處。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稱選集：「欲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公」；梁簡文帝〈與

⁷⁸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7月），第七章，四、〈論劉克莊詩〉，頁240-249；附錄三，〈江湖詩禍考〉，頁362-368。

⁷⁹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卷二十六《後村先生大全集》，頁1299-1306。

湘東王書〉述文學批評：「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⁸⁰無論是文學作品之指導或文學原理的建構，選集多與詩話同功。方回《瀛奎律髓》自序云：「所選，詩格也；所註，詩話也」，無論詩格詩話，性質多接近文學批評。何況篩選作品，選擇作家，取捨多寡之間，實無異文學批評或價值判斷。選本之為書，往往具有重大之批評價值，表現自身之批評機制；而且潛藏豐富、多樣、靈活之批評方式。⁸¹就宋代詩歌選本而言，尤其蘊含有學習前賢優長，追尋詩學典範，建構宋詩宗風，鼓吹詩派風尚之作用在。今考宋元書目、《宋史·藝文志》、方志經籍志，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宋人總集敘錄》，知宋人所編宋詩選本，大抵在二十種以上。

宋人選宋詩，見於著錄者多，從可見閱讀、接受、宗法、傳播之大凡。有唐詩宋詩兼採者，如倦叟《詩家鼎鑪》二卷、孫紹遠《聲畫集》八卷、劉克莊《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二十卷、何無適《詩準》四卷、方回《瀛奎律髓》四十九卷、蔡正孫《詩林廣記》二十卷、以及蔡正孫《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要皆有刊本或抄本傳世。其他尚有散佚不傳者，如羅某、唐某《唐宋類編》二十卷、王安石《四家詩選》十卷等書。北宋元祐以後，宋詩特色既已逐漸形成，於是宋人選宋詩乃次第編選刊行，如呂本中《江西宗派詩集》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葉適《四靈詩》四卷、陳起《江湖集》九卷、《江湖後集》二十四卷、陳思、陳世隆《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劉瑄《詩苑眾芳》一卷、曾慥《皇宋百家詩選》五十七卷、鄭景龍《續百家詩選》二十卷、陳起《增廣聖宋高僧詩選》五卷、杜本《谷音》二卷諸書皆是也。

⁸⁰ 郭紹虞：《照隅室雜著》，〈隨筆·詩話叢話〉，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頁272-274。

⁸¹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7月），〈導言〉，頁4-10。

兩宋前後三百多年，宋詩經歷許多生成、消長、嬗變、發展，形成不少大家名家，蔚為若干詩派詩體。自嚴羽《滄浪詩話》、方回〈羅壽可詩序〉、袁桷〈書湯西樓詩後〉、《四庫全書總目》、全祖望〈宋詩紀事序〉、宋犛《漫堂說書》，⁸²或詳或略，多有論說。其中以全祖望之說提綱挈領，能立其大，較得理實，如云：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慶曆以後，歐蘇梅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詩派者，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緻，四壁俱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降，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為迫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宋詩紀事序〉）

依全祖望之見，宋詩歷經四變，為派凡六，其間知名詩人有楊億、劉筠、王禹偁、歐陽脩、蘇軾、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四靈、江湖、文天祥、謝翱、鄭思肖、汪元量等，皆以詩鳴。外加邵雍、朱熹、諸道學家詩，宋詩之發展與嬗變，大抵略具於是。筆者考察宋人別集、總集編刻流傳之情形，發現與宋詩大家名家之才人代出，各領風騷，聲氣相呼應。今翻檢祝尚書撰《宋人別集敘錄》、《宋人總集敘錄》，⁸³參考《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從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切入，選擇雕版印刷為核心，以討論宋詩之發展與嬗變。

宋詩在學古通變，自成一家之歷程中，先後集結若干詩人群體，相互標榜推轂，形成許多詩派詩體，如1、西崑體；2、東坡體；3、江西宗派；4、四靈詩派；5、江湖詩派等等，所謂「宋調」、「唐音」者是。

⁸² 同註70，梁昆：《宋詩派別論》，一、〈分派法之商榷〉，頁2-5。

⁸³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月）。

試觀宋代詩文總集如《西崑酬唱集》、《坡門酬唱集》、《江西宗派詩集》、《四靈詩選》、《江湖集》前、後、續集，以及黃昇《詩家鼎鑿》、陳思《兩宋名賢小集》、方回編選《瀛奎律髓》等，考察上述諸選集總集之刊本、藏本，詩人群體之文學活動，在版本、目錄、文獻學上，亦多有具體之呈現：

（一）北宋詩文總集與宋詩體派

嚴羽《滄浪詩話》論及宋代詩歌體派，謂以時而論，有江西宗派體；以人而論，有東坡體、山谷體，又有所謂西崑體。清全祖望〈宋詩紀事序〉謂宋詩有四變：西崑體後，歐蘇梅王數公出，一變；涪翁江西詩派出，再變；南宋四大家後，永嘉四靈出，三變；「嘉定以降，《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四變。⁸⁴今參考諸家討論宋詩體派之說，定以己意，選擇詩文總集版本之多元者，以推想傳媒效應對宋詩特色之推助。

1. 《西崑酬唱集》與西崑體

為掃除五代以來淺薄蕪鄙之氣，宋初盛行西崑體。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楊億編成《西崑集》酬唱之作，以用典贍博，屬對精工，音韻和諧，語言濃豔為特徵。西崑體盛行，以「彩綉閎肆，雄渾奧衍」為長，與當時流行「白體」淺切粗俗之詩風，形成對照反差，足以療治淺俗蕪鄙之流弊。《六一詩話》稱：「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可見《西崑酬唱集》此時已付梓，有刊本；《天祿後目》著錄有寶元二年（1039）刊本二部。鄭樵《通志》卷七十，著錄《西崑酬唱集》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玉海》卷五四、《文獻通考》卷二四

⁸⁴ 〔清〕全祖望，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卷二十六，〈宋詩紀事序〉，頁1246-1247。

八，《宋史·藝文志》著錄，皆作二卷。

論者稱：自真宗咸平元年（998）至仁宗明道二年（1033），為西崑詩風全盛期；明道三年（1034）至英宗治平三年（1066），為西崑衰沒期，前後主盟宋初詩壇六十八年。⁸⁵事實上，「猶是唐賢風格」之崑體詩歌，其流風遺韻尚廣被南北兩宋，如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下稱：「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境」；近人鄭騫亦謂：「莫道楊劉無影響，西崑一脈到江西」，足見崑體之流風遺韻。⁸⁶北宋詩文革新標榜「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為療治率易淺滑之弊，南北宋之際詩文曾回歸於崑體。至南宋，真德秀、魏了翁亦推重楊億之道德文章。元方回《瀛奎律髓》亦多選西崑詩作，多所肯定。

2. 《三蘇先生文粹》、《坡門酬唱集》與東坡體

北宋孝宗頗喜三蘇詩文，朝野蔚然成風，於是邵浩編纂蘇軾兄弟與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六君子，往復唱和之作，為《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於紹熙元年（1190）「命工鋟木，以廣其傳」。⁸⁷先是，則有饒州德興縣董應夢集古堂於紹興三十年（1160）刊行《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八十卷；《三蘇文粹》七十卷，傳存至今之宋槧尚有四部；其他《三蘇先生文粹》亦存留宋刊本四部（日本宮內廳有藏本一百卷，不殘）；《重廣分門三蘇先生文粹》一百卷，現藏日

⁸⁵ 同註70，〈西崑派〉，頁26；又，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卷一《西崑酬唱集》，頁15-16。

⁸⁶ 參考曾棗莊：《論西崑體》（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10月），第一章〈《西崑集》行，風雅一變〉，頁1-10；周益忠：《西崑研究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3月），二、〈再論西崑衰落之因緣——並說所謂崑體工夫〉，頁60-66。

⁸⁷ 邵浩：《坡門酬唱集》（紹熙元年豫章原刊本，今藏台北國家圖書館），張叔樁〈序〉，頁179。

本宮內廳書陵部，宋刊殘帙藏上海圖書館。明《古今書刻》卷上稱：宋建寧坊書坊、眉州等刻有《三蘇文集》；南宋郎曄編注《經進三蘇文集事略》一百卷，大約淳熙紹熙間已刊刻行世。今尚存宋刻殘本兩部。⁸⁸

由傳世宋槧刊本之多，推想圖書出版市場之供需相求機制，以之考察南北宋宗蘇學蘇風氣之消長，思過半矣。陸游《老學庵筆記》載有「蘇文生，吃菜羹；蘇文熟，吃羊肉」之民謠，可具體反映南北宋之交，蘇軾著述流行之一斑。有關蘇軾著述，生前已在契丹遼國廣泛流傳。至南宋，「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三朝北盟會編》稱：金人指名索書甚多，其中，「蘇、黃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諸書，由「開封府支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清翁方綱《甌北詩話》卷十二謂「宋難渡後，北宋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蘇東坡、黃山谷最盛」，於是金代「諸家俱學大蘇」；而有「蘇學行於北」之事實。⁸⁹除外，蘇軾堂廡極大，門庭甚廣，有所謂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更影響南宋及金元之蘇詩學，雕版印刷促成文化傳播速度之革命，其中自有推波助瀾之效應。（參考上文「別集」項，蘇軾部分）

3. 《江西宗派詩集》與江西詩派

自黃庭堅創立江西詩社宗派，呂本中（1084-1145）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劉克莊亦作〈江西詩派總序〉，可見當時詩壇確有此宗派。⁹⁰淳熙十一年（1184），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十，〈江西宗派詩序〉稱：據謝幼槃之孫源所刻《江西宗派詩集》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江西知府程叔達憂心江西宗派詩「往往放逸」，故「彙而刻之於

⁸⁸ 參考張高評：《宋詩體派敘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82-0301-H006-015），一、〈東坡詩派代表作家〉，頁6-35。

⁸⁹ 同註53，第三章〈「蘇學行於北」〉，頁156-161。

⁹⁰ 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10月），第四卷，〈江西詩社宗派圖內容之分析〉，頁261-327。

學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稱：《江西詩派》一百三十卷，《續派》十三卷，馬端臨《文獻通考》著錄亦同。大抵「刻非一時，成非一手」，沉曾植所謂「有舊本，有增刻。諸家次第，見於宋人記述者，各各不同」；⁹¹《宋史》卷二百九，〈藝文八〉著錄「呂本中《江西宗派詩集》一百十五卷，曾紘《江西續宗派詩集》二卷」，總集其詩，刊而行之；楊萬里命書名為《江西續派》，序作於寧宗嘉泰三年（1203），足見南宋嘉泰年間，江西詩風仍興盛不衰，故《江西宗派詩集》有《續派》之編纂與刊行。

梁昆《宋詩派別論》，論江西詩派之消長，分為四期，前後百餘年，各有代表詩人，大抵四十家。⁹²考察宋代詩話、筆記之主體詩論，或宗江西、或反江西，大抵不出此兩大統系。其中，主流詩學，為表彰江西詩人，推崇蘇軾、黃庭堅，發揚江西詩派詩學理論者，則為主宋調之詩話，如陳師道《後山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朱弁《風月堂詩話》、張表臣《珊瑚詩話》、吳可《藏海詩話》、范溫《潛溪詩眼》、吳玠《優古堂詩話》、許顥《彥周詩話》、《王直方詩話》、《洪駒父詩話》、《潘子真詩話》、唐庚《唐子西語錄》、蔡條《西清詩話》、呂本中《紫薇詩話》、《呂氏童蒙訓》、曾季狸《艇齋詩話》、陳巖肖《庚溪詩話》、趙與虜《娛書堂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劉克莊《後村詩話》等等。正當蘇黃詩風盛行，江西詩法風行天下之際，別有一派，以反對蘇黃、非薄江西、或修正江西相標榜，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蔡居厚《蔡寬夫詩話》、葉夢得《石林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黃徹《碧溪詩話》、嚴羽《滄浪詩話》等等。更有出入諸家，折衷於唐宋詩之優長者，如釋惠洪《冷齋夜話》、楊萬里《誠齋詩話》、陸游《老學庵筆

⁹¹ 沈曾植：〈重刊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序〉，同註83，頁75-79；頁148-149。

⁹² 梁昆：《宋詩派別論》，以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為次期作家代表。繼之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蕭德藻，為江西派三期作家。再繼之以趙汝讜、趙汝談、趙蕃、韓淲四公，為四期作家。

記》、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范晞文《對床夜話》、敖陶孫《敖器之詩話》等等。宋代詩話於宋調唐音，無論標榜、反對、或折衷，都與時代風潮相呼應；其編寫雕版之情形，所謂消長榮枯，亦與市場導向、消費心理息息相關。從宗江西與江西詩學之討論，折衷唐宋詩話之兼取優長，亦可窺江西詩風影響之廣大。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稱此派所以繫「江西」者，主要在「以味不以形」；易言之，彼此詩風有其共相。學界研究，論述其思想內容、詩法技巧、藝術淵源，確有相通相融之處。⁹³江西詩人自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尤袤、蕭德藻後，其勢漸衰，而後有四靈派、江湖派出。（參考上文「別集」項，黃庭堅部分）

（二）南宋詩歌總集與宋詩體派

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山谷以下列陳後山等二十五人；《宋史·藝文志》載《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是其總集。其後，歷經四期，而江西式微。首先楊夔反江西大纛者，為永嘉四靈詩派；迨詩苑厭棄四靈，乃促成江湖詩派之崛起。其後江湖詩風流於纖巧、俚俗，詩人遂引進江西詩美以振濟之，於是晚宋江西詩又呈復興之勢。考察上列詩風之流衍，南宋所編纂詩總集，多可見詩派之消長存亡。如《四靈詩選》之於永嘉四靈；《江湖集》、《詩家鼎鑪》、《兩宋名賢小集》之於江湖詩派，《瀛奎律髓》之於江西詩派「一祖三宗」，每一子題，多牽連廣大。今祇概論各詩派特色，提示圖書流通、印本傳播之大凡。深究探蹟，請待異日。

1. 《四靈詩選》與四靈詩派

永嘉四靈派之起有二端：一則不滿於理學家「以道學為詩」之詩論，

⁹³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10月），第七章〈江西詩派的詩歌理論〉，頁192-219。

一則針砭江西派「資書以為詩」之缺失，轉學晚唐，刻意求新，以詩作為陶寫性情之具。四靈詩派，尤其不滿慶曆嘉祐以來，江西詩人之連篇累牘，汗漫廣漫，故標榜「風騷之至精」之唐詩以救治之，於是追求晚唐之苦吟鍛煉，講求律詩之浮聲切響，大抵而言，即是宋調之反撥。⁹⁴

四靈派詩，《徐照集》曾有家刻本行世，久佚。葉適為其中之倡導與領袖，曾選編總集，稱《四靈詩選》，選詩五百篇，作為鼓吹。許棐《跋四靈詩選》曾述及陳起雕版刊行《四靈詩集》，所謂「芸居(陳起)不私寶，刊遺天下」；合刊別集本凡八卷：《徐照集》三卷、《徐璣集》二卷、《翁卷集》一卷、《趙師秀集》二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著錄卷數亦同。清孫詒讓有《影鈔殘宋本四靈詩集跋》，陸心源藏有毛氏汲古閣舊藏影寫宋刊本，並作〈影宋鈔永嘉四靈詩跋〉。原汲古閣舊藏，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卷中有「宋本」、「稀世之珍」朱印。⁹⁵

2. 《江湖集》前集、後集、續集，與江湖詩派

陳起，字宗之，號芸居，為南宋臨安睦親坊書舖陳宅經籍舖主人，能詩，有詩集《芸居乙稿》。陳起具書商兼詩人身份，方回《瀛奎律髓》稱：「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宋之刊《江湖集》以售。」⁹⁶考察《江湖集》所收詩集自序，陳起直接向詩人索稿者，多先經印可，或詩人主動交稿，請求編選刊印。無論何者，多有利於詩篇之傳播通行。陳起善用印刷傳媒之優勢，間接促成江湖詩人蔚為一大詩派，徵存文獻之功極大。

⁹⁴ 同註73，第七章〈四靈體：宋調之反撥〉，頁189-194。

⁹⁵ 同註83，頁316-318。參考陳增杰校點：《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前言〉，頁2-12；嚴紹璁：《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沈》（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頁206。

⁹⁶ 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卷二十，〈梅花類〉，劉潛夫（克莊）〈梅花〉詩後批語，頁843-844。參考同註71，〔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宋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頁113-139。

《江湖集》初刊於南宋寶慶紹定間。由於《江湖集》中五位詩人之四聯詩，涉嫌右丞相史彌遠廢立之謗訕，因而獲罪。《江湖集》書版及印本慘遭劈版禁毀，陳起「坐流配」，不久赦還，此所謂「江湖詩案」。因《中興江湖集》集中詩句觸犯忌諱，《江湖集》慘遭劈版，詔禁士大夫作詩。影響所及，《江湖集》散佚不全，職此之故。見於後世著錄，《江湖集》有前集、後集、續集，皆為宋刻。此一詩歌叢刊，載錄一百一十餘家，存詩一萬餘首。《四庫全書總目》《江湖後集·提要》：「今檢《永樂大典》所載，有《江湖集》、有《江湖前集》、有《江湖後集》、有《江湖續集》、有《中興江湖集》諸名，其接次刊刻之跡，略可考見」；「其書刻非一時，版非一律」。

論者稱：《江湖前、後、續集》，流傳到明清，有宋版兩部：其一，明末毛晉汲古閣景鈔本；其一，清曹寅藏本。此二本蓋從《江湖前、後、續集》中選出半數，以迎合讀者購求。書商之選刻圖書，從可見《江湖集》叢書之備受歡迎。⁹⁷由《江湖集》之慘遭劈版，詩集版本刊刻之多樣，可見其風行一時之概況。

3. 《詩家鼎鑪》、《兩宋名賢小集》，與江湖詩派

文淵閣《四庫全書》載存不著編人之宋人總集《詩家鼎鑪》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七，集部總集類二推測，蓋南宋慶元嘉定間書肆刊本，「如陳起《江湖小集》之類」。其書上卷列詩人五十八，下卷列三十七人，所存詩多者十餘首，少者僅一二首，即鼎嘗一鑪之意。據今人研究，《詩家鼎鑪》收錄南宋中後期詩人詩作，選詩以江湖詩派詩人為主，地籍分布以福建、浙江居多，大抵體現晚宋詩壇宗尚晚唐詩

⁹⁷ 參考胡念貽：《中國古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南宋《江湖前、後、續集》的編纂和流傳〉，頁277-294。參考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大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3月），三、〈文治的陰影：宋代禁書面面觀〉，5、宋代的最後一部禁書——《江湖集》，頁52-55。

風之傾向。當時刊本傳播，影響及於《詩人玉屑》、《玉林詩話》、《柳溪近錄》。「鼎嘗一臠」之選詩方式，對於《分門纂類唐宋名賢千家詩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等宋元之際之詩歌選本，多有啟發。⁹⁸江湖詩派及晚唐詩風藉印刷傳媒之流布，影響反饋於宋元之際之詩壇，亦可以想見。

除外，又有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所錄宋人詩集，始於楊億，終於潘音，凡一百五十七家」。舊題陳起所刊《江湖》諸集六十餘家，亦包括其中。論者稱：「陳起與陳思絕非一人」，陳思於理宗紹定五年（1232）曾編輯刊行《寶刻叢編》，咸淳三年（1267）又刊刻《書小史》，又編纂有《海棠譜》、《書苑菁華》、《小字錄》諸書，可見陳思為專業學者又兼出版商。胡念貽撰文指出：陳思既是南宋之書商，編選宋人詩集，為將本求利，自然可以收入陳起之《江湖·前後續集》之一部分，「這在宋代，不以為嫌。陳起的《江湖集》，就收入了一些同時人的刻本」。⁹⁹圖書行銷作為商品經濟，這是慣技。就供需相求而言，可見江湖詩集廣受歡迎愛賞，書商發現有利可圖，於是摻雜拼湊，以迎合讀者購求，此亦勢所不免。《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稱：《江湖集》「所錄不必盡工，然南渡後詩家姓氏不顯著，多賴是書以傳，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沒也」；編纂詩歌總集，有利於知識流通，此固不易之理。

4. 方回《瀛奎律髓》與一祖三宗

方回（1190-1257），生當宋末元初，四靈、江湖詩派專師晚唐，尊唐抑宋成風之際。撰有《桐江集》、《桐江續集》，又選評唐宋律詩

⁹⁸ 《詩家鼎臠》二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五五一。《四庫》本選錄詩人95位，詩178首；清抄本則存詩人96位，詩180首。參考卞東坡：〈晚宋宋詩選本《詩家鼎臠》考論〉，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第十一輯，頁20-37。

⁹⁹ 同註97，胡念貽：《中國古代文學論稿》，頁278-286。

為《瀛奎律髓》四十九卷，經由類選、圈點、評論，進行詩學批評。其書縮合詩選與詩話於一書，大抵排西崑而主江西，標榜一祖三宗，全面體現宋代江西詩派之詩學觀點；尤其在拗字、變體方面，特立兩卷討論，凸顯了江西派注重詩法、詩格（藝術技巧）。方回論詩，欣賞闊大之境界及雄渾之氣象，追求枯淡瘦勁、剝落浮華之美，標榜「格局」，以救江西流弊，又以「細潤」濟粗獷，以「圓熟」濟生硬，以「豐腴」濟枯澀。總之，除鼓吹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等江西詩法之外，要能使創作蔚為蒼勁瘦硬風格為依歸。¹⁰⁰方回《瀛奎律髓·自序》謂：「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瀛奎律髓》一書，實即唐宋之律詩精髓。而且書中所選，宋代之作家作品，數量遠勝過唐代，推崇表彰宋詩之意圖甚明。

杜甫其人其詩，尊奉為「詩聖」，稱揚為「詩史」，評價為「集大成」，宋詩名家大家如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陸游、文天祥、元好問、方回等，皆宗法之，蔚為宋人學詩作詩之典範。宋人對唐代詩文集之整理，成果豐碩；古籍整理，有所謂「千家註杜」之業績，而雕版刊行，藏本傳鈔者，得杜集版本129種，1240卷以上，¹⁰¹可謂著述浩瀚，琳琅滿目矣。刊刻本傳鈔本如此眾多可觀，自然影響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對於詩歌選集之采擷，詩話筆記之論述，學詩作詩之典範，自多接受與觸發。《瀛奎律髓》成書於至元二十年（1283），方回五十七歲，唐詩與宋詩別集或雕版，或傳鈔，傳世版本不虞匱乏，採擷選編容易，於是選詩3014首，385家，其中宋詩入選1765

¹⁰⁰ 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前言〉，頁3-5。蕭榮華：《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下篇宋元第五章，七、1。〈方回與江西詩學的餘波〉，頁215-218。

¹⁰¹ 張高評：〈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章培恆主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556-632。

首，221家，江西詩派作家入選尤多，宋詩比重亦超過唐詩。方回標榜宋詩，崇尚江西詩派之詩學旂向，由此可見。

方回論詩，推崇宋詩，標榜「一祖三宗」，為江西詩派辯護。「唐宋詩之爭」，自葉夢得、張戒、劉克莊、嚴羽論詩主張宗法唐詩、唐音以來，唯方回獨樹異幟，凸顯宋詩及江西詩之價值與地位，曾言：

嗚呼！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後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焉，餘可配饗者有數焉。（《瀛奎律髓》卷二六，陳與義〈清明〉詩批注）

老杜詩為唐詩之冠。黃、陳詩為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同上，卷一，陳簡齋〈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由此觀之，方回論詩，以杜甫為「一祖」，黃、陳、陳為「三宗」，¹⁰²主要在矯正江西末流之詩病：但學黃廷堅，不知追本溯源，祖法杜甫之偏頗。而且藉此壯大江西陣營，擴大後學眼界。既溯源宋詩之譜系至杜甫，足見宋人詩乃是唐詩之繼承與發揚。唐宋詩統系既一脈相傳，自不可隨意抑揚。¹⁰³論者以為，方回對江西詩派詩論價值之提高，體質之改造，以及師法之傳授，多具有積極之意義與貢獻。清初吳之振極推崇《瀛奎律髓》，以為「固詩林之指南，而藝圃之侯鯖」也。

《瀛奎律髓》編成時，即有刊本流傳。《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元版集部》、《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皆以為「元至元癸未（二十年，1283）刊巾箱本，其板至明天順間始廢」。其他，尚有明成化三

¹⁰²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第四章〈方回「杜詩學」綜論〉，頁63-92；第六章〈方回對江西詩派的總結定論〉，頁117-158。

¹⁰³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第四編第三章第二節〈方回〉，頁925-930。

年（1467），紫陽書院刻本《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陸士泰刻本；五十一年（1712），蘇州綠蔭堂刻本《瀛奎律髓刊誤》四十九卷；五十二年（1713），吳之振黃葉村莊刻本等等。在「唐宋詩之爭」各執一端，交相攻詰之清初，宗唐派之馮舒、馮班、紀昀對《瀛奎律髓》各作評點刊誤；宗宋派之吳之振、查慎行亦藉評點《瀛奎律髓》張揚己說。宗唐宗宋各自表述，亦如唐詩宋詩之優劣高下，自由心證，¹⁰⁴此中自有探察之天地，頗耐觀玩。

由此觀之，雕版印刷為古籍整理、校勘、編選、纂集成果之最終呈現，可以考察一代學風宗派之嬗變與消長。總集別集從編輯校勘諸古籍整理工作，至「命工刊板，務在流通」之雕版行銷，促進了知識傳播之快捷與便利，頗便於宗派門戶之形成，以及詩風文風之相激相盪。西崑派、東坡詩派、江西詩派、四靈詩派、江湖詩派嬗變與消長，與各詩派總集別集整理雕印之質量相互呼應。研究文學詩歌，不能自外於版本、目錄、文獻之學，由此可見。

四、結論

本文從圖書傳播談到印刷傳媒之效應，復從印本文化注重厚積博觀，讀書窮理，談到詩人創作與文風士習；然後據此討論宋代詩人別集在宋代之雕版刊行，宋代詩人選宋詩及其刊印流布，宋詩體派形成與宋代詩文總集雕印之互動關係。初步獲得下列觀點：

（一）六朝四唐之知識傳播，以楮墨替代簡帛，簡約輕省，便利已數倍

¹⁰⁴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6月）第一期，頁83-158；又，〈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年7月），頁87-122。

於前。迨雕版印刷崛起，「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由於「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本」，學者之於圖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因此，筆者以為：印刷傳媒之效應，足以推助宋詩特色之形成。

- (二) 印刷術的普遍運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宋代雕版印刷之繁榮發展，自有其使命與目的：其一，監本官刻本之使命，在冀傳華夷，興教濟眾；其二，家刻本、坊刻本，期盼「布之四方，圖永其傳」；其三，就教育文化而言，雕版圖書更以資鑑致用，度人以金針自許；其四，就中央集權，統一政教而言，對於書坊刊本，嚴格進行監控，實施看詳禁毀。總之，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於右文崇儒而已矣。
- (三) 雕版印刷繁榮於宋代，與寫本藏本爭輝爭勝，蔚為宋代圖書傳播之多元，助長宋詩特色之形成，提供唐宋變革之觸媒，「詩分唐宋」自當以印刷傳媒作為催化劑。本文論述宋詩別集總集在宋代之雕版印行，發現版刻質量之優劣多寡，大抵與詩壇之審美品味相當，與詩集選集傳播接受之寬廣度有關，更與宋詩之發展嬗變埒鼓相應。印刷圖書之為商品，自然切合供需相求之原理。
- (四) 大抵宋詩名家大家，如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為宋詩特色之先導；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為宋詩宋調之建構；陳師道、陳與義、范成大、楊萬里、陸游，見江西詩風之嬗變；邵雍、朱熹詩歌，得理障理趣之消長；劉克莊、戴復二家，知宋詩宋調之變奏。凡曾影響當代，流傳後世者，其圖書傳播除寫本、鈔本外，又皆有頗多之雕版印本作為圖書傳媒。雕版詩人別集之取捨選擇，與詩風之流變走向，若合符節。
- (五) 從宋人選刊宋代詩文總集，亦可考察宋詩體派之流衍，如《西崑酬唱集》之於西崑體，《三蘇先生文粹》、《坡門酬唱集》之於

東坡體、《江西宗派詩集》之於江西詩派、《四靈詩選》之於四靈詩派、《江湖集》前、後、續集、《詩家鼎鑪》、與《兩宋名賢小集》之於江湖詩派，《瀛奎律髓》之於一祖三宗。無論詩集選集之雕版刊行，因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優長，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利多，相較於寫本鈔本，印刷傳媒遂快速成為知識傳播之利器。

- (六) 印刷傳媒之圖書信息量如此豐富多元，如此無遠弗屆，宋代士人面對如是之知識觸媒衝擊，於是提倡博觀厚積、讀書窮理。雕版印刷又與科舉取士齊頭並進，相資為用，落實推動宋朝「右文政策」，對於「詩分唐宋」，自然直接相關。至於連鎖反應，因而影響到閱讀定勢、創作心態、學術風尚，和社會發展，造成「唐宋變革」，宋代具有近代之特徵。
- (七) 宋代之印刷傳媒，造就繆鉞所謂宋詩與唐詩風格之殊異，蔚為錢鍾書所謂「詩分唐宋」之文學事實；助長「唐宋變革」，促使「近世特徵」之呈現。試對照谷登堡活字印刷所引發之傳媒效應，如讀書撰述之昌盛、閱讀習性之改易、規矩法度之講求、能入能出之提倡、詩話評點之崛起、文學體式之嬗變、學術風尚之轉變，實與宋代文學風格之形成有關，多值得研發開拓。
- (八) 印刷傳媒之傳播效應，有一定之歷程，自是漸進、遞強、加深、增廣，終至於引發閱讀接受、反應反饋。本文討論印刷傳媒對宋詩發展之關聯，本當作共時性之分析，與歷時性之考察，然限於篇幅，本人尚未作適宜之處理。感謝博雅方家之審查意見，建議參考「石遺老人《宋詩精華錄》之宋詩四期說，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的六期說加以爬梳。」的確，結合宋詩分期研究，以探討印刷傳媒之效應，以及圖書傳播諸課題，十分重要，值得再撰寫若干篇論文，以發其他幽微。凡此種種，姑記於此，他日再議。

引用文獻

一、古籍原典（以時代為序）

- 〔劉宋〕范曄《後漢書》，清王先謙《集解》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長沙王氏校刊本。
-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
- 〔宋〕楊億編《西崑酬唱集》，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
- 〔宋〕王禹偁《小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86，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蘇舜欽《蘇舜欽集編年校注》，傅平驤、胡問濤校點，成都：巴蜀書社，1991。
- 〔宋〕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註》，朱東潤校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3。
-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
- 〔宋〕邵雍《擊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01，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 〔宋〕王安石《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05，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蘇軾《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蘇軾《蘇軾詩集》，清·王文誥、馮應榴輯註，孔凡禮點校，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
- 〔宋〕黃庭堅《山谷詩集注》，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宋〕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影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宋〕陳師道《後山詩注補箋》，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宋〕陳與義《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鄭騫校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
- 〔宋〕陳與義《陳與義集校箋》，白敦仁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富壽蓀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宋〕楊萬里《楊萬里集箋校》，辛更儒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陸游《劍南詩稿》，錢仲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宋〕邵浩《坡門酬唱集》，紹熙元年豫章原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本。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商務印書館。
- 〔宋〕朱熹《朱熹集》，郭齊、尹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宋〕朱熹《朱子全書》，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永嘉四靈詩集》，陳增杰校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宋〕陳起編《江湖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57冊，台北：商務印書館。
- 〔宋〕陳起編《江湖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57冊，

- 台北：商務印書館。
-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62冊，台北：商務印書館。
-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
- 〔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 〔宋〕戴復古《戴復古詩集》，金芝山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宋〕佚名《詩家鼎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51冊，台北：商務印書館。
- 〔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宋〕王應麟《玉海》，中日合璧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
-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64。
- 〔宋〕黃堅選編《古文真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 〔元〕方回《瀛奎律髓彙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203。
- 〔元〕脫脫《宋史》，《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清〕吳之振《宋詩鈔》，上海：三聯書店，1988。
-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呂友仁校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
- 〔清〕清康熙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 〔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朱鑄禹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杜維運考證，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1-7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1-36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二、近人專著（以出版先後為序）

- 湛之（傅璇琮）編《楊萬里范成大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
- 繆鉞《詩詞散論》，台北：開明書店，1977。
- 梁昆《宋詩派別論》，台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
- 萬曼《唐集敘錄》，台北：明文書局，1982。
- 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
- 蕭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 郭紹虞《照隅室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台北：洪範書店，1987。
- 胡繩等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
- 蔣士詮《忠雅堂詩集》，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
- 胡念貽《中國古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 劉尚榮《蘇軾著述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 錢鍾書《宋詩選註》，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 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大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 東景南《朱熹佚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美學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張高評《宋詩三百名家評傳—北宋詩人八十三家》，NSC82-0301-H-006-05。
- 張高評《宋詩體派敘錄》，NSC82-0301-H-006-015。
-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 曾棗莊《論西崑體》，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
-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四川大學中文系主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嚴紹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沈》，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 蕭榮華《中國詩學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 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 周益忠《西崑研究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9。
-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
- 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 王友勝《蘇軾研究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0。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 楊巨中《中國古代造紙史淵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 曾棗莊等《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呂肖奐《宋詩體派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 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
-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三聯書店，2002。
-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 清水茂《清水茂漢學論集》，蔡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日〕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劉陽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韓琦增訂，插圖珍藏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n-Jean Martin）《印刷書的誕生》，李鴻志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三、期刊論文

- 吉川幸次郎〈宋人の歴史意識——資治通鑑的意義〉，《東洋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四號（昭和41年(1966年)3月）。
-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事

業出版公司，1977。

劉尚榮〈《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初探〉，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王水照〈陳寅恪先生的宋代觀〉，《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8。

內山精也〈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係〉，《新宋學》第一輯，2001。

露西爾·介（Lucile Chia）〈留住記憶：印刷術對宋代文人記憶和記憶力的重大影響〉，《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思想家》II），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1期，台北：學生書局，2002。

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高雄：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4。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印本之普及與朝廷之監控〉，《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5。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查屏球〈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朱東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張高評〈杜集刊行與宋詩宗風——兼論印本文化與宋詩特色〉，章

培恆主編《中國中世文學研究論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張高評〈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代印本文化之形成——兼論印本圖書對學風文教之影響〉（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二期，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6。

卞東坡〈晚宋宋詩選本《詩家鼎鑪》考論〉，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十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照〉，香港大學中文學院80週年慶「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7。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已接受刊登。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成功大學中文系《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8。

Distribution of the Sung Poetry and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wi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nting Media on the Features of the Sung Poetry

Kao-Ping Chang*

Abstract

The engraving technique, as a means of circulation of books, emerges and reaches its apogee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and replaced the laboriously made written copies. Due to the accessibility of books, scholars of the Sung Dynasty are renowned for their erudition, which in turn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oetic style of Sung. Eventually, this phenomenon becomes the genesis for the revolution in both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Consequently, the printing media is the catalyst for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engraved printing of the Sung poetry's special collection, I discover that the aesthetics taste of writers depends largely on the demand of the book market; whilst the quality of the printed books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he reader's reception of the poetry collection, b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ng poetry as well. Poets such as Wang Yuchen, Su Shunqui, and Mei Yaochen are pioneers of the features of the Sung poetry. As for Ou Yangxui, Wang Anshi,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are poets who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oetic style of Sung. Chen Shidao, Chen Yuyi, Fan Chengda, Yang Wanli, and Lu You belong to th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ircle of Jiangxi poets. The poems by Shao Yong, Zhu Xi reveal the forces of rationality. Liu Kezhuang and Dai Fugu are famou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ic style of Sung. The famous works which have survived since then are passed down through manual copies, but mostly through engraved printing copies. Judging from the aesthetic taste and market economy of collections of poetry and essays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one is able to understand too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ic style of Sung. For instance, Xikunchouchang Collection belongs to the “Xikun style”, and Sansuxiansheng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is classified as “Dongpo style”; Siling Selected Poems belongs to “Siling styl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graved books—easy to produce, difficult to eliminate, cost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for collection, which are much more better compared with the written copies in terms of circu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 printing media has become a convenient tool for knowledge-spreading.

Keywords: the printing media, style of the Sung poetry, Sungkansungren Poetry, Tang and Song poetic demarcation, distribution of books